

畬族研究回顾

陈元煦

畬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史书就有记载有关畬族族源的传说，宋代已出现畬族的古称“畬民”和“拳民”。自此以后，几乎史不绝书，尤其是明、清两代的志书，更是大量地记载了有关畬族的历史和文化、来源和迁徙、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以及畬族人民反封建斗争的情况。丰富的史料，为开展畬族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畬族研究，基本上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许多学者就对畬族的族源、语言、文化、风俗习惯进行了研究，发表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如1911年刊于《人类学杂志》的西本省三《清代浙江省处州的畬族》和山崎直方《“畬”与畬族》，1926年刊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董作宾《说“畬”》和《畬语十八名》，1927年刊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集刊》的董作宾《福建畬民考略》，1932年刊于《福建文化》的魏应麒《畬民之起源与“畬”字之商订》，1933年由中央研究院出版（德文版）的

史图博、李化民《敕木山畬民调查记》和刊于《金陵学报》的徐益棠《浙江畬民研究导言》，1936年和1937年刊于《民族学研究集刊》的何联奎《畬民的图腾崇拜》和《畬民的地理分布》，1944年刊于《福建文化》的傅衣凌《福建畬姓考》，1947年刊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凌纯声《畬民图腾文化的研究》等。这些论文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力作，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畬族研究有深刻的影响和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新中国成立前发表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多，总量大约50篇。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工作的深入开展，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畬族研究也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央对畬族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调查研究。即1953年的畬民识别、1958年的畬族社会历史调查、1982年和1986年的畬族传统文化调查。调查面广，涉及全国畬族分布省份的众多畬乡，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留下许多颇具科学价值的调查报告，为研究畬族打下坚实的基础。实践证明，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许多著作、论文，其资料有不少都是来自这些调查报告。在广大畬族研究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先后共出版了数十本畬族著作，二百多篇畬族学术论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无论是研究成果的总量，还是研究问题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越了新中国成立前。对畬族许多学术问题的研究，都在不断深入。下面主要介绍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畬族的族源研究

关于畬族族源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前到现在，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最主要的是两种意见：一是畬族

源于古代“蛮”人，二是畬族为古代越人的后裔。

(一) “蛮”人说中的不同说法

1. 畬瑶同源说于汉晋时代“武陵蛮”说

1962年杭州大学历史系徐规教授的《畬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一文首先提出畬瑶同源说于长沙“武陵蛮”。1963年中山大学黄家教、李新魁《潮安畬话概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罗美珍《畬族所说的客家话》，毛宗武、蒙朝吉《博罗畬语概述》等文章，从语言学角度论述畬瑶渊源关系十分密切。1982年石光树《从盘瓠神话看苗瑶畬三族的渊源关系》和1983年施联朱《关于畬族来源和迁徙》两篇论文，进一步阐述这个观点。他们的主要论点：①畬瑶都具有相同的盘瓠图腾崇拜；②史籍记载往往是畬瑶并称，甚至说畬族就是瑶族，畬瑶相通；③具有相同的姓氏和风俗习惯；④畬族的《开山公据》与瑶族的《过山榜》，都载有相同内容的盘瓠传说；⑤语言上的亲属关系说明同源是可信的。

主此说的除引共同的盘瓠传说和若干文献记载（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说：“五溪种类……大率皆盘瓠之后。”《皇清职贡图》引《连江志》云：“畬民，五溪盘瓠之后也。”《遂昌县志》云：“遂昌有畬民者，本盘瓠之种，其后繁衍为五溪蛮。”《福安县志》云：“居深山中，有异种曰畬民，相传为五溪盘瓠遗种”）外，对“武陵蛮”如何南迁到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地，何时南迁？南迁的路线是怎么走的？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因为至今还没有一篇文章比较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

已故潘光旦教授曾在20世纪50年代对畬族族源作了一番研究，他的论点：畬族源于武陵蛮，与东夷靠西南的徐夷——徐

偃王有密切渊源关系。费孝通教授1982年写的《民族社会调查的尝试》一文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的东夷是靠西南的一支徐夷，与苗瑶畚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入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畚；另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就是苗”。

1984年张崇根的《畚族族源新证——兼说畚族与越族无关》一文，将畚族源于武陵蛮的看法向前推进一步。认为武陵蛮中的一支莫瑶，在唐宋之际迁移过程中，分别形成新的族体——畚族和瑶族，还有一部分加入到苗族中去。文章从盘瓠图腾是鸟和犬二合一的图腾、历史地名会稽不在浙江而在山东、大禹没有到过浙江等方面论证畚族与越族无关。

畚族干部蓝周根的《关于畚族来源》一文提出：“畚族既不是百越的后裔，也不是武陵蛮的后裔，而是东夷的徐夷的后裔。”

以上是蛮人说的各种不同看法。

2. 畚族系属“南蛮”的一支说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施联朱、蒋炳钊、陈元煦、陈佳荣合编的1980年出版的《畚族简史》一书，认为畚瑶同汉晋时代长江的崇奉盘瓠传说的南蛮有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而畚族乃上古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南蛮的一支。王克旺等人的《关于畚族的来源》一文，对此说作了进一步探讨，认为畚族乃东汉时代久居广东的南蛮的一支，是广东的土著民族。认为瑶族源于武陵蛮，畚族与武陵蛮无亲缘关系。

3. 畚族为“河南夷”的一支

肖孝正《畚族族源初探》，认为畚族是“河南夷的一支”，

河南的汝南，颍川等郡都是畬族的故乡和发祥地。

4. “闽”为畬族的先民

这个观点同畬族为“蛮”人后裔说有关，就是陈元煦的《试论闽越与畬族的关系》一文中所说的，认为闽和越都是我国南方的两个古老民族，闽族系福建土著，乃畬族之先民；越乃南来的客族，畬族非衍出于越族。

此外，2002年6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畬族研究书系，其中吴永章《畬族与瑶苗比较研究》一书，从历史、政治与文化层面对于族别相邻的畬、瑶、苗三族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三族都是盘瓠的子孙，这个观点与上述介绍畬族为“蛮”人后裔说的论述，也有某些相同相似之处。还有谢重光《畬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一书，把畬族的酝酿、形成和发展过程放在六朝隋唐以来武陵蛮及北方汉族人民南迁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从闽粤土著与南迁武陵蛮及汉族居民相互斗争和融合的角度，阐述了畬族族源是多元的。认为畬族、客家、福佬都是文化的概念而不是种族的概念，这三个族群长期在血统上互相混合、文化上互相涵化等新的观点。

（二）越人后裔说的不同说法

虽都主张畬族是越人的后裔，但提法是有区别的，即同中有异。如王新民《越王勾践子孙考》一文认为畬族乃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或范蠡的子孙；已故傅衣凌的《福建畬姓考》一文认为畬族是战国、秦、汉时代的越人后代；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认为畬族是源于汉晋时代的“山越”等多种说法。主张这些说法的论点：①多数是根据畬族和越族古今地理分布的对照、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的偶同或从族称义、音的演变去推论；②畬族与越族有共同的盘瓠传说；③畬族与百越有

共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④畬族和越族有共同的风俗习惯等。

蒋炳钊的《畬族族源初探》、《从盘瓠王歌探讨畬族来源和迁徙》、《关于畬族来源问题》和《畬族史稿》等论著，又进一步阐述了畬族为越人后裔说的论点，同时对畬族源于“武陵蛮”和“闽人”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

总之，畬族族源问题，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诚如梁任公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所说的，“最难解者无过福建人”。畬族也是福建人，也成为“最难解的民族”了。所以我们福建的许多志书谈到畬族的族源，往往以“不知其所始”或“不知其何所祖”了之。

更有趣的是《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将“畬蛮”与所谓的“盘古国”、“女蛮国”、“飞头国”等怪诞不经的“国”等同看待，都一起被列入《南方未详诸国部》，可见畬族族源是个相当难解的问题，所以在畬族族源研究中，学术界未达成共识，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

二、畬族的图腾文化研究

畬族图腾研究，发表过多篇专论文章，如新中国成立前的何联奎《畬民的图腾崇拜》、凌纯声《浙南畬民图腾文化的研究》和《畬民图腾文化的研究》等；新中国成立后，姜永兴《广东九连山畬族的图腾崇拜》、陈训先《粤东畬族的族源及图腾崇拜》，陈元煦《图腾崇拜琐谈》、王克旺《论畬族图腾文化的个性特征》和肖孝正《再谈畬族图腾——兼与“盘瓠即犬”和“畬族狗图腾”说商榷》等文章。

上述这些研究畬族图腾文化的论文，有一点基本上是共识

的，即畬族崇拜的图腾物是盘瓠。不多谈了。畬族有无别的图腾物？盘瓠指什么？从近年发表的文章看，仍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畬族先民可能有过崇拜蛇图腾

以往研究畬族图腾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是朝着单一思维的模式考虑问题。实际上这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家知道图腾是与母系氏族社会同时产生的，而当各部落尚处于分散、独立的状态，彼此缺乏来往，各氏族必然是崇拜各自的图腾，不可能只有一个共同的图腾崇拜物，当一个氏族发展为两个以上的氏族，新生的氏族就有了新的图腾，因此，一个氏族有几个图腾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根据这个特点陈元煦在《畬族图腾崇拜物琐谈》中，从畬族栖息的地理环境、福建发现的蛇石刻和民间流传的蛇习俗以及地方志记载的材料综合分析，认为畬族的先民处于原始母系社会时期有过崇拜蛇图腾的观点。而且还认为随着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深入，畬族图腾物可能还有新的发现和认识。

（二）盘瓠并非指犬

1. 盘瓠指葫芦

肖孝正的《再论畬族图腾——兼与盘瓠即犬、畬族狗图腾说商榷》一文认为所谓“盘瓠即狗”、“盘瓠狗图腾”是历史阶段的误会。畬族图腾盘瓠是葫芦，是母系氏族社会早期的葫芦图腾崇拜的继承。他认为“因盘瓠长期错位为狗”，有人故意在畬族人面前说“狗”或“盘瓠”，才引起畬族人民反感，甚至出现互相对骂为狗。这怎能理解为畬族狗图腾禁忌呢？还有畬女凤冠髻、五彩凤衣，明明是高辛五彩鸟凤凰，硬被凌纯声文章说成是“狗冠、狗毛五彩”，连畬族儿童做跷跷板游戏

都被看成为“跳狗舞”。氏族图腾最重要的一点，是“外婚制——图腾群内的分子、不相通婚”，而畬族是族内几个姓氏相婚的，怎能以“畬族是狗图腾”牵强附会解释呢？所以肖氏结论是“畬族图腾是凤凰（凤凰是鸟和太阳）、葫芦、龙的崇拜。盘瓠即狗和畬族狗图腾是谬误的”。

2. 盘瓠指人

王克旺的《论畬族图腾文化的个性特征》一文认为畬族崇拜的始祖盘瓠，是已具有人形的盘瓠，和三公主结婚时，已是脱离动物状态的人了。意思是说盘瓠是人。

3. 盘瓠指虎、熊

因为犬在古书中还有一种含意，是虎子或熊子，如《尔雅》中就明确说“熊虎丑，其子狗”，意思是说“熊虎这类猛兽它们的幼兽叫狗”。晋人郭璞注《尔雅》说“虎购钱三千，狗半之”，即小虎只值老虎的一半。《左传》中也说“熊虎之类，其子名狗”。可见从古书中记载看，“狗”本为“熊虎之子”，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家犬之类。有没有存在这样一个可能，畬族原来是崇拜虎，后人把虎子异化变成了家犬呢？如果这个解释能成立的话，那么畬族曾经崇拜的犬图腾，应该是“虎子图腾”或“熊子图腾”。这个问题是1995年作者在宁德举行的畬族民俗讨论会上提出来的，但还没有更多的资料来论证它。不过现在已知道的畬族有做“西王母”的习俗，传说西王母最初是一个原始部族名，这个部族领袖也叫西王母，虎是这个部族的图腾物，畬族做“西王母”，是不是也崇拜虎呢？这只是作为思考的问题提出来罢了，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畬族的舞蹈调查研究

畬族有没有舞蹈呢？由于种种原因，长期被人误认为没有舞蹈，或者说畬族的舞蹈多已失传；有的干脆说：畬族有歌无舞；更为武断的，有的说“畬族自古根本就没有自己的舞蹈”。一句话就是否认畬族有舞蹈。正因为这样汤滔同志写了《畬族自古有歌无舞辩》的文章，回答这个问题。

说畬族只是有歌没有舞，那是大错特错的。我们认为畬族不仅有优美的歌，也有舞蹈，而且它的舞蹈是多姿多彩的，仔细去研究它，欣赏它，无不惊叹叫绝，可以说它的舞蹈也称得上是我国民族舞蹈艺术中瑰宝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者发掘整理出许多畬族的传统舞蹈，如祭祖礼俗类的舞蹈：《祭祀舞》、《日月舞》、《龙头仪》、《迎祖舞》、《铃刀舞》、《行罡舞》等；婚丧喜庆类的舞蹈：《迎客礼》、《敬酒舞》、《四角厅》、《八角厅》、《六节花》、《告慰仪》等；劳动生产类的舞蹈：《猎捕舞》、《栽竹舞》等。而且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创作许多新的舞蹈。如《欢乐的鸭姑》、《畬岭迎亲》、《凤凰彩带飞北京》、《蚯蚓之歌》等。许多舞蹈的造型独特多姿，风格庄严典雅，动作是高难度的，一般人还不易学会呢。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大量的传统舞蹈我们还没有去发掘整理出来。举一个例子，畬族的丧葬舞蹈，肖孝正的《民族又一瑰宝——畬族传统舞蹈》，文中仅仅只介绍了《六节花》和《告慰仪》两个简单的舞蹈。《六节花》是死者亲属绕尸跳舞，表示告慰死者，告别亲人。《告慰仪》舞者三五人，在收殓前跳舞。在许多介绍畬族丧葬舞蹈的文章都有转引肖孝正的这两个舞蹈。实际畬族丧葬舞还很多，如《造水洗坛舞》、

《造坛舞》、《造井舞》、《收师舞》、《落未舞》、《排兵出门舞》、《安祖宗》等等。这是丧葬的系列舞蹈，节奏清新明快，舞姿煞是好看。这些舞蹈其实还都没有介绍出来，所以我们说，畬族不是没有舞，而是大量埋藏的舞蹈还有待我们去深入发掘和整理。这应该说也是我们民族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的一项任务吧！

四、畬族与客家的关系问题

随着畬族研究和客家研究的深入，学术界研究这个课题，有的从畬族研究提出同客家的关系，有的从客家研究提出同畬族的关系。这是因为历史上畬族与客家两个群体的先民曾经共同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的山区，由于有此共同的地域，产生了多层面的双向文化互动，血缘交融，文化交融，关系极为密切。所以研究畬族历史必须注意对客家的研究，研究客家历史也必须注意对畬族的研究。最早注意这个问题研究的是客家学开拓者罗香林教授，他在1933年所著的《客家研究导论》中就提出：“客家先民与畬族通婚，血缘交融。”后来在1950年著的《客家源流考》中又提出：“一以表白客语实际与体系，一以推证客家与其他族系的交互关系。”在此之后发表有关畬族和客家关系的文章就很多了，有的从语言谈、有的从历史谈，像1981年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1985年陈宏文《客家方言前途问题初探》，1987年吴炳奎《广东梅县畬族考》，1991年朱洪、姜永兴《畬族与汉族客家人的关系》，1992年陈元煦《福建畬族与客家异同简论》、李默和张博祥《论客家的形成及民族融合》、蒋炳钊《试论客家与畬族的历史关系》，1994年房家学《客家源流探奥》，王东《论客家民系之形成》，

以及新近出版的谢重光《畬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等，都列举大量客家与畬族关系的史实。这里简要介绍几个涉及畬族、而学术界又有不同看法的问题。

(一) 客家的界定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和古直《客对》都认为“客家”的“客”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给客制度”之“客”。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唐德宗时区分土地所有制的主户与佃户，即客户与佃户的两税法制，客家是“客户”的“客”。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宋元时期分主、客户的户籍管理制度，客家是“客户”的“客”。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畬族自称“山哈”或“山客”，与同居这一地域的客家先民混称而来，为区别两个不同族体而称“客家”。这个意见同蒋炳钊《论客家与畬族的历史关系》一文中对客家的界定有相似之处。蒋文中说：“客家被称为‘客’，不是与其他汉区相对而言，而是与同住在一起的土著畬族而言，所谓‘主客’或‘土客’之分，应以同在一个聚居区内来区分的。”

朱洪《谈畬族与汉族客家民系的文化互动关系》一文说：畬族先民先于客家先民居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先入为主，后到为客。

吴福文《客家称谓的由来》说：“客家实乃客家民系‘时是客，处处是客’的独特的历史命运的结果。”

方芳珍、刘纶鑫《客家正名》说：“从五代赵宋到明初，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带，既不存在一块客家基本住地，当地也不存在自唐宋以来称‘客家’的居民，不存在称‘客家方言’的方言及名为客家民系的民系。客家是什么呢？‘客家’

一名应是明清闽、粤、赣三省交界地一股特殊移民浪潮的产物。所谓‘客家’是指明清时（主要是明中叶后）由三省交界地大批外迁的移民，称客家。”

李逢蕊《客家人界定初论》一文，认为能称得上客家人的条件，可概括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特征的人，就叫做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

最后一种意见是谢重光的《客家源流新探》中提出的观点，认为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是按照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和共同文化及其所表现的共同心理素质诸要素界定客家的。

总之，客家如何界定，目前学术界还是众说纷纭。有待进一步讨论。

（二）客家民系形成与畬族的关系

客家民系形成于何时，有多种说法：

1. 房家学《客家源流探奥》云：“秦至南朝是客家共同体的初步形成。”

2. 吴炳奎《客家源流新探》云：“在南朝，客家民系已经形成。”

3. 陈运栋《客家人》、邓迅之《客家源流研究》和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等书认为：“客家民系形成于五代至宋初。”罗香林认为：“自时间言之，当以赵宋一代为起点。”

4. 李默、张溥祥《论客家与民族融合》一文则认为：“客家民系形成于明正德年间以后。”

5. 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一书认为：“客家民系

形成于清朝。”

民系形成的时间不一，但同畬族又有什么关系呢？学术界论证客家民系形成过程，除个别意见，一般都认为与畬族有密切关系。如：

钟家谋《当前客家学的三大课题》一文中说“客家是中原汉族的一支”。这个观点似乎不能成立，因为历史上在中原没有形成过什么客家民系。这里无疑是把客家民系说成为纯粹的汉族血统，没有同其他民族混化，这个意见，显然不符合实际。

朱洪《畬族与汉族客家民系的文化互动关系》一文指出：客家民系形成是“中原部分汉人逐步南迁定居于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长期与畬族共居、相互交往、通婚、文化双向互动，而演化成为有别于畬族，又有别于汉族其他民系、既保持汉族的主体文化，又受其他民族和民系的文化渗透，形成具有地区文化特征的客家民系，这是在特定社会历史和自然地理条件下，与畬族双向文化互动的结果”。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客家民系的形成，首先得有客家与畬族长期共居作为前提，然后才有双向文化的互动，最后才有客家民系的形成。

几乎所有研究客家民系形成的文章，都要论及与畬族关系这一重要内容。所以畬族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关于畬族与客家的双向文化互动问题

近年发表畬族与客家关系的文章，无一不谈到畬族与客家的双向文化互动问题。但所列举的有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多数都是谈二者之间的共同性。就是说畬族有什么，客家也有什么。或者说客家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某方面所具有的特征，

同样畬族也具有。如论服饰就说客家与畬族两者趋同日多；如论妇女地位，就说客家与畬族妇女地位亦同；如论民间宗教信仰，又说“畬族与客家人两个群体都是佛道结合、多神崇拜”；论喜爱山歌，就说“客家与畬族都爱唱山歌”、“都是热爱山歌的民族”。讲畬族与客家的这些文化共同性，我认为也是对的。问题是既然讲畬族与客家双向文化互动，那么应该再深入一步，在物质或精神文化的某一方面是谁影响了客家，还是客家影响了畬族，也就是说主要是畬族影响了客家，还是客家影响了畬族。就以山歌来说，二者都爱唱山歌，音乐工作者深入畬族和客家地区进行调查，发现闽东罗源县畬族人民中流行一种山歌曲调与长汀山歌的一种唱法甚为接近。闽东福鼎与武平桃溪、上杭城关等地的客家山歌有紧密联系。那么这里畬族与客家山歌的曲调接近，究竟是谁影响了谁呢？文章没有指出来。依我看畬族对客家的影响可能性大。其他文化方面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总之，从学术界研究可以表明，历史上畬族与客家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一般学者都认为客家先民原居中原一带，东晋开始南迁，宋代以后形成客家。那么客家何时进入闽、粤、赣三省界地区？谁是当地的土著居民？畬族与客家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畬语同客家话的关系、畬语如何演变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五、畬族的语言问题

对畬族语言，有个认识过程。新中国成立前认为畬族语言是属于汉语，断言它不是少数民族的一种语言。

新中国成立初认为“畬族基本上是以汉语客家方言为其共

同语言的”，说法不够全面。

20世纪50年代介绍全国少数民族语言，往往都是说“各民族中除回族、满族、畬族通用汉语外，其余均使用本民族语言”。意思是说畬族没有本民族语言。

60年代明确提出“畬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其系统十分接近汉语”。

直至80年代罗美珍《畬族所说的客家话》，蒙朝吉、毛宗武《畬语简志》和施联朱、蒋炳钊、陈元煦、陈佳荣合编的《畬族简史》等，都明确提出畬族使用两种语言。尽管描述不尽相同，但意思都是一样：即广东惠东等四县一千多自称“活聂”的畬族人使用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的一种语言。其余99%畬族使用另一种语言，即接近汉语客家方言，但又跟现在汉族客家人说的客家话又有所不同，它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尚有一些自身的特点。这些都是老意见了，不在这里作一一介绍。笔者想说的是去年问世的游文良《畬语研究》一书的最新观点。

游文良经过二十多年的闽、浙、赣、粤等省二十多个点的畬语调查，写出各地区的畬语调查报告和文章，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全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畬语著作。对全国99%以上的畬族语言作了深入的研究。认为畬语是从隋唐时期的古代畬语发展演变成为宋元时期的近代畬语，再发展演变成为今天的现代畬语。而近代畬语成分是现在各地畬族语言的共性，而畬族新居住地的汉语方言成分则是现代畬语中地区性的特性。各个时期畬语所涵盖的语言成分不是完全一样的。它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的语言，绝非一个时代的产物，改变了过去学术界长期认为畬语是“属于汉语客家方言”或称畬语

是“畬族所说的客家话”的观点。与此同时，作者还对现代畬语的特征作了科学的分析，根据各地畬语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的地域性特点，结合各地畬族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划分现代畬语为闽东、闽北、闽中、闽南、浙南、浙北、浙中、粤东、赣东等九个方言区。这种对畬语的分期和现代畬语的分区是畬语研究的新发展，也是对畬语研究的新贡献。

此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畬族研究书系，除上面已提到的吴永章《畬族与瑶苗比较研究》，谢重光《畬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和游文良《畬语研究》外，还有蓝雪霏《畬族音乐文化》，蓝炯熹《畬民家族文化》和雷弯山《畬族风情》等三部著作。这套丛书都是在进行广泛田野调查、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出的力作。丛书不乏创新观点，如《畬族音乐文化》关于“双条落”的研究，作者质疑以往几十年一贯视“双条落”（双音）为等义并称的观点，见解独到。丛书论述问题，力求广收博采，如《畬民家族文化》引用的谱牒史料，颇为外间所不易见，始《宁化茜坑村〈雷氏家谱〉》、光泽积谷岭《雷氏族谱》，还有一些未刊行的手抄稿及口碑史料，也赖是书以传，难能可贵。总之，这套丛书的问世，反映了畬族研究的最新成果，将畬族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以上是对大约一个世纪以来有关畬族几个问题研究的扼要回顾，挂一漏万，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作者单位：福建师大历史系）